

道德与功名：论《史记》士人的两难困境和精神突围

岳素芳^{1*}

(¹ 延安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

摘要：司马迁《史记》的系列士人传记完整勾勒了从春秋至西汉中叶的士人图谱，深刻揭示了其在集权强化进程中的生存困境与精神抉择。面对道德理想与功名现实的冲突，士人群体分化出“道德理想者”“功业追求者”与“调和者”三类典型，他们的困境根植于外在的制度挤压与内在的价值撕裂。因此，向内恪守“知止有定”的道德律令，或向外寻求“发愤著书”的立言不朽成为他们实现精神突围的两种路径。这一内在持守与外向求索的核心范式，正是中国古代士人精神价值最为深刻的体现所在。

关键词：司马迁；《史记》；士人传记；道德困境；功名追求

DOI: <https://doi.org/10.71411/zgwxxk.2026.v1i1.639>

Morality and Fame : On the Dilemma and Spiritual Breakthrough of Scholars in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Yue Sufang^{1*}

(¹ Yan'an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Yan'an, Shanxi, 716000, China)

Abstract: The series of scholar biographies in Sima Qian's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systematically portrays the intellectual landscape from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to the mid-Western Han Dynasty, offering profound insights into their existential predicaments and spiritual choices amid the growing centralization of power. Confronted with tensions between moral ideals and career aspirations, the scholar-official community diverged into three archetypal groups: "moral idealists," "career-oriented pragmatists," and "reconciliation seekers." Their dilemmas stemmed from both external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and internal value conflicts. Consequently, they pursued two paths to spiritual transcendence: inward adherence to the moral principle of "knowing limits and maintaining resolve," or outward expression through "channeling frustration into writing" to achieve immortality through words. This core paradigm of inner perseverance and outer striving embodies the most profound manifestation of spiritual values among ancient Chinese scholars.

Keywords: Sima Qian;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Biographies of scholars; Moral dilemmas; Pursuit of fame and official ranks

作者简介：岳素芳（2002-），女，甘肃天水，硕士，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通讯作者：岳素芳，通讯邮箱：1573721179@qq.com

引言

《史记》作为中国史学与文学的典范，以其纪传体例和宏大视野，塑造了众多鲜活的秦汉士人形象，这一独特群体的演变历程与精神风貌素来是学术研究的重要课题。学界对士人的研究经历了从身份起源到精神结构的深化。顾颉刚提出“士人由武士蜕化而来”，奠定了其社会起源的研究基础；余英时则从“知识分子”角度阐释其文化使命，推动研究转向精神传统层面。在《史记》士人形象的专题研究方面，呈现出从整体性论述到多元理论阐释，再逐步深入到精神结构的演进趋势。韩兆琦、李长之等学者的著作奠定了研究基础，而张群等学者则直接以士人的内在世界为分析框架，对士人类型进行精神品格层面的划分。然而，现有研究多侧重于个案考辨或宏观述评，尚缺乏对这一群体所面临的核心困境与精神回应的系统性探讨。因此，从“两难困境”与“精神突围”视角切入，系统考察《史记》中的士人群体，不仅显得尤为必要，也为深化秦汉精神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士人阶层始终处于政治与道德、理想与现实的双重困局之中，他们既肩负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文化使命，又不得不面对君臣纲纪的制约与历史洪流的裹挟。司马迁在《史记》中通过士人传记，建构了道德理想者、功业追求者、现实适应者的多元士人图谱，或如伯夷、叔齐坚守节义而饿死首阳山，或如屈原忠而被谤、韩信功高见诛，或如管仲、晏婴权衡变通而成就功业，这些士人的命运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士人面临的核心困境：道德理想与功名追求的结构性矛盾。

1 士人三相：道德与功名的类型图谱

1.1 道德理想者的悲歌

儒家将“闻道”与“行道”确立为人生的终极追求，彰显了其将道德认知置于生命延续之上的价值取向。儒家思想中最为提倡的人生理想即为立功，立德，立言，可概括为“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并以此为安身立命之道”^{[1]43-45}。儒家虽然肯定生命的可贵，“生，吾所欲也”（《孟子·告子上》），但始终强调道德价值对生命的超越性，孟子认为：“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上》）。“当生命存续与道义持守不可得兼时，便会选择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道德决断”^{[2]55-58}。这种将道德理想置于生命之上的价值选择，体现了儒家伦理思想中道德理想主义的根本特质，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精神高度的生命价值观。

司马迁《史记》中不乏高举道德理想旗帜的士人群体，他们以崇高的个人品格践行政治抱负，以生命为代价维护道德理想的纯粹性，当道德坚守导致自我毁灭时，当道德付出与福运获得不一致时，现世功名追求与道德理想坚守的紧张关系便愈加突出。《伯夷叔齐列传》中的伯夷、叔齐便是最具象征意义的殉道者，“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这种为恪守孝礼而双双放弃君位的行为，奠定了他们作为道德理想主义者的人格基调。当周武王东伐纣时，伯夷、叔齐叩马而谏，“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这句掷地有声直指武王以暴力革命取代道德正义的矛盾政治，最终二人毅然决然选择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的殉道之路。孔子称其“求仁得仁，又何怨乎”，司马迁评价“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絜行如此而饿死！”二者的叩问共同构建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道德困境叙事。又如投江殉道的道德理想者屈原，“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的非凡才德，换来的却是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怀疑冷落，之所以遭疏遭贬，正在于楚怀王不能明辨是非，使屈原陷落于“君臣不知”的困境^{[3]15-26}，最终选择抱石投江而死。司马迁以“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蠖乎”的屈原自白，凸显其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的道德坚守。再如《刺客列传》中的刺客豫让为报智伯的知遇之恩，发出“士为

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为报仇而死”的誓言，其采取“漆身为厉，吞炭为哑”极端的自毁方式，完成了复仇语境中的道德坚守，以惨烈自残形体之方式，凸显了道德选择的绝对性和纯粹性。以上士人均为典型的道德理想者，在道德理想与功名追求中，他们以生命为代价，保全了自身道德坚守的纯粹性。

1.2 功业追求者的矛盾

在《史记》的叙事体系中，功业追求者又构成了另一种士人群体的生存情境，他们既不同于伯夷、叔齐式的道德绝对主义者，也区别于李斯、张仪式的功利实用主义者，而是游移在道德理想与现实功业之间的“中间形态”而存在。通过信陵君、侯羸等典型人物的生命轨迹，展现了战国士人在价值抉择上的深层悖论：在追求历史功业的同时，又无法彻底摆脱道德自律的精神羁绊，最终导致其在行动场域中陷入持续的伦理焦虑与存在性矛盾。

《魏公子列传》中的信陵君魏无忌“仁而下士，是无贤不肖者皆谦而礼交之，不敢以其富贵骄士。”彰显出其礼贤下士、从谏如流、诚实守信的高尚道德形象，但当秦围邯郸之时，信陵君面临艰难抉择：是遵守君臣之礼服从魏王，还是“窃符救赵”违抗君命？这是忠君与救国的矛盾，也是道德与法则的冲突，以仁义著称的公子最终选择了“请如姬盗晋鄙兵符”的权谋之道，司马迁用“矫魏王令代晋鄙”，一针见血地揭示了这一行为在法理上的不正当性，其本质早已沦为政治欺诈。“窃符救赵”成功后，信陵君留赵十年不归的自我放逐，及至晚年“与宾客为长夜饮，饮醇酒，多近妇女”的自我放纵，最终“病酒而卒”的结局，彻底瓦解了其早年建立的道德形象，这种精神世界的崩塌与自毁式的沉沦，实则是其无法调和道德理想与现实政治矛盾的必然结果。同样在《魏公子列传》中的谋士侯羸也面临着道德理想与功名追求的困局，“侯羸年七十，家贫，为大梁夷门监者”的笔触，一位贫寒高洁的隐士形象跃然纸上，可在信陵君置酒宾客时，侯羸“摄敝衣冠，直上载公子上坐”的倨傲举止，又颠覆了上文修身洁行的品格，在这种对立的结构中，实则暗示了隐士内心对功名的潜在渴望。“窃符救赵”的谋划将侯羸推向伦理困境的顶点，计策虽救赵国于危亡成就了大业，实际上其已然违背了“不事王侯”的隐士准则，而“臣宜从，老不能。请数公子行日，以至晋鄙军之日，北乡自刭，以送公子。”的最终结局，既是对“士为知己者死”的践行，更是对参与政治阴谋的道德自惩。侯羸之死，既成就了信陵君的功业，又洗刷了自己“设诡计”的道德污点；既兑现了对知己的承诺，又保全了作为隐士的最后尊严。以个体见群体，这一人物也揭示了战国时期士人群体的普遍困境：既要报答知遇之恩成就功业，又难以完全摆脱道德约束，司马迁以侯羸式解答的时代隐喻表明——在权力功名与道德理想的夹缝中，死亡反而成为最彻底的解脱。

1.3 调和者的生存智慧

在《史记》众多士人传记中，范雎、蔡泽等典型人物又代表了一种现实主义智慧，他们以灵活变通的处世策略，在道德理想与功名追求之间建立了动态平衡。与为道而殉和深陷两难的士人不同，这类士人展现出“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的实践理性，为士人群体生存图谱开辟了第三条道路。

《范雎蔡泽列传》中的范雎、蔡泽是战国乱世中一流的谋臣策士，二人人生轨迹皆是从有罪之身到一朝平步青云，因此被称之为困厄之后的“一切辩士”^[4]，史公对其忍辱发愤、功成推贤的人生观是褒扬的。范雎被魏相魏齐羞辱后，以假死逃至秦国，凭借权谋成为秦相。其提出“远交近攻”的战略，“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这番论述既满足了秦国扩张的野心，又巧妙地规避了道德风险。当秦王欲为其报仇时，他并未被仇恨冲昏头脑，反而以“臣闻明主立政，有功者不得不赏”为由劝阻秦王，将快意恩仇的私德问题，转化为赏罚分明的治国原则，这种以公义解私怨的智慧，使他在雪耻的同时亦不失政治家的格局。

而在权力巅峰时期，他能够清醒地接受蔡泽“四时之序，成功者去”的劝告，最终“谢病请归相印”，实现了功成身退的圆满结局。蔡泽“日中则移，月满则亏”的天道观劝说法则，实际上是对道德与功名的调和尝试，他承认功名追求不可避免要使用“扬言激怒以探其志”的手段，但也强调需在功成后回归道德自律，即“成功之下，不可久处”，这种思想以道家“天道循环”的理论为根基，结合黄老之学，试图在功利与道德间寻找平衡。蔡泽拜相后不久便称病归还相印，司马迁指出蔡泽“垂功于天下者，固强弱之势异也”，暗示这种急流勇退的选择非但没有削弱其影响力，反而成就了其十余载平稳的仕宦生涯。司马迁以“二子不困厄，恶能激乎”作评，点明此类士人群体的特殊价值——他们既不被道德教条束缚，也不沦为权力的奴隶，而是在认清政治本质后，在道德理想与功名追求之间创造性调和，即随世俯仰、与时进退。

这三类士人形象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价值图谱，展现了士人应对价值困境的不同选择。其中，道德理想者确立了人格高度的坐标，功业追求者揭示了现实政治的复杂引力，而调和者则探索了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可行路径。司马迁并未简单推崇某一类型，而是通过多元士人命运的铺陈，展现其对于“土之为士”的深层思辨，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在道义坚守与现实妥协之间，士人所面临的，实为一种结构性、永恒性的伦理困境。这一深刻洞察，使《史记》不仅是对历史人物的记录，更成为对士人精神本质的持续探索。

2 困境根源：制度与精神双重挤压

2.1 权力制约下的道德困境

西周建立的宗法制度原本是一个严密的社会等级体系，以“亲亲尊尊”为基本原则，通过血缘关系维系社会秩序。在这一制度下，士人作为最低级的贵族阶层，其身份地位和社会功能相对固定。《礼记·王制》记载：“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这种明确的等级划分，为士人提供了稳定的生存空间和价值定位。然而，随着周王室权威的衰落及原有的世卿世禄制逐渐瓦解，士人不再能依靠世袭身份获得稳定的政治地位，而必须通过个人才能谋求晋身之阶。这种变迁重新规定了士人阶层的社会定位，“士”这种低级贵族是介于卿大夫与庶民之间的特定知识阶层，即“士”是一类游离于上下的特殊群体。他们可以因事功突出或军功显要而擢升为卿大夫阶层，也可能因不称职或过错飘移至社会底层的庶民群体中^{[5]102-104}。与此同时，这一转变也使得士人陷入彻底的身份焦虑之中，犹如孟子所言：“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者”。一方面，这种危机迫使士人群体必须要以强烈的向上态度面对现实的严酷，通过自身才能实现阶层的跨越与个人价值的实现；另一方面，传统保障机制的解体将士人群体置于紧张的生存状态中，这使得其不得不重新定义自身的存在价值，而这一过程必然伴随着道德理想与现时功名的冲突。

春秋前期，晋国发生了以庶代替正宗的“曲沃代翼”事件。为了加强国君的权力，避免旁系庶支的威胁，晋国摈弃了自西周以来的“亲亲尚恩”制度，实行了任贤尚功的政策^{[6]138-141}。商鞅变法中“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的政策，标志着世卿世禄制的终结和军功授爵制的确立，这种制度变革表面上为士人提供了更为公平的晋升通道，实则将他们纳入了一个更为严密的权力控制体系。这一由“亲亲”至“尚功”的进程，至秦建立以郡县制为核心的中央集权体制而达于顶峰。汉代承秦制而损益之，通过察举、征辟等制度，构建起更为严密的官僚体系。士人虽得“孝廉”“贤良”等晋身之阶，然此制度在开放通道的同时，亦以功名利禄与道德名教为手段，实现了对知识精英更精巧的掌控。纵观从晋国“弃亲尚功”至汉代官僚网络成熟之历程，君主权力日趋集中，士人则由宗法附庸转化为帝国官僚，其身处权力制约与个人道德、命运自主的复杂困境之中。《史记》便通过《汲郑列传》和《酷吏列传》展现了汉代专制官僚体系下士人群体的挣扎和异化。《汲郑列传》中的汲黯是位好直谏，守节义的忠臣，他敢对皇帝犯颜直谏，但却因触怒武帝与其他朝臣而“欲诛之以事”。郑当敬贤下士、廉谨忠厚，其试

图在官场中保持平衡“趋和承意，不敢甚斥臧否”，但却最终依旧无法摆脱被排挤的命运。两人的困境，归根结底是专制官僚体制下正直之士的普遍悲剧。在皇权至上的时代，官员的升沉荣辱皆系于帝王一念之间，而官场中又充斥着公孙弘、张汤之类曲学阿世的权臣。汲黯因刚直而遭忌，郑当因清廉而失势，无论采取何种处世态度，都难以在腐败的体制中全身而退。在《酷吏列传》中，张汤的仕途轨迹生动展现了权力制约下官僚的异化过程。在皇权至上的汉代官僚体系中，张汤敏锐地察觉到权力的运作逻辑，司马迁尖锐地指出其：“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监史深祸者；即上意所欲释，与监史轻平者。”这种完全以君主好恶为判案标准的做法，使法律沦为权力的附庸；临终时竟无余财所存的廉洁将讽刺意味拉满，暗示了在权力制约下，士人道德持守与功名追求内在价值的撕裂。

2.2 价值冲突中的精神困境

春秋战国之际，以孔子为典范的儒家士人群体应运而生，他们作为新兴的文化精英阶层登上历史舞台。面对周室衰微、礼乐崩坏的社会剧变，孔子以“士”的身份，对时代转型期的文化秩序重建进行了系统性思考。春秋晚期以降，士就通过孔子提出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全面的人格目标，建立起蕴含儒家核心价值的理想人格范式^[7]，这一人格构想呈现出鲜明的层次性：以“道”为终极导向，以“德”为内在根基，以“仁”为实践准则，以“艺”为外在表现。然而战国以降，诸侯争霸的社会动荡，价值冲突的思想变局，使得诸子学说纯粹的道德理想主义岌岌可危，各国君主对人才的需求由“尊德性”转向“道问学”，催生了“得士者强，失士者亡”的功利性人才观。孔子“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及孟子“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明确地反映出士人群体内部已出现人格分化和价值撕裂的走向，这一走向的代价便是士人群体深陷道德理想与功名追求的两难处境，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士志于道”的精神传统在现实政治中的结构性困境，导致士人群体陷入于精神挤压的内部矛盾中。

首先，道统与政统的永恒矛盾造成了士人的根本性焦虑；在《商君列传》中，商鞅见秦孝公时先后陈述帝道、王道，而最终唯有“霸道”之说获得采纳，证明理想化的治国方略已让位于即时见效的强权政治。在《孟子荀卿列传》中，驺衍“其语闳大不经”的学说变异，即将理论学说玄妙化的同时，又不忘辅以仁义道德之说突显其实用性，其本质不过是为获取君主关注的生存策略。其次，内部矛盾还表现在道德实践遭遇权力系统的排斥；屈原的悲剧就是“道尊于势”的传统信念与“势高于道”的政治现实之碰撞，他的精神困境源于无力以道抗势，他的痛苦绝望源于势高于道，特别是势以暴力形式对道的贬抑和否定^[7]。这一内部矛盾更深层的危机在于价值评判体系的彻底瓦解；在《货殖列传》中，“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记载，客观反映了传统义利观的崩解过程，这种价值体系的异变在《平准书》中得到支撑：“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显示财富积累已取代道德操守成为社会地位的主要评判标准。《李斯列传》记载李斯从“仓鼠之叹”到“督责之术”的转变，完整呈现了士人价值取向的功利化过程。其中“诟莫大于卑贱”的言论，标志着传统道德观在现实利益考量下的退场。本质而言，现实政治解构了“士志于道”的精神传统，从而导致士人群体不得不面临道德理想与功名坚守的精神困境。

《史记》所呈现的士人道德困境，本质上是制度性压迫与精神性挤压共同作用的产物。一方面，秦汉以降的官僚体制与君主专制，通过军功授爵制、察举制等制度，将功名显达塑造为唯一成功标准。另一方面，先秦儒家“士志于道”的超越性追求，为士人构筑了崇高的道德人格理想；这种外部制度约束与内部道德诉求的激烈碰撞，使士人群体陷入无可逃避的生存悖论——坚守道德意味着边缘化，追逐功名则必随之异化。

3 平衡之道：道德超越与精神突围

3.1 “知止有定”论：自我道德之约束

“知止有定”是中国传统士人道德哲学的核心命题之一，源于儒家的中庸思想，正如《礼记·大学》所言：“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知止”的首要内涵是对行为限度的清醒认知，这里的“止”并非消极的退缩，而是对“可为与不可为”的明确界定，其哲学基础在于儒家中庸思想所强调的对度的把握。在权力运用里，要明确职权范围的不可逾越性；在获取利益中，要把握正当所得与不当得利的限度；在情感表达上，要节制个人好恶避免影响理性判断。“有定”是“知止”所导向的精神境界，指主体在明确界限后形成的稳定人格状态。二者共同构成了道德修养的一体两面，“知止”以“有定”为前提，没有界限认知的定力只是盲目坚守；“有定”以“知止”为升华，缺乏精神定力的界限终将流于形式。

司马迁在《史记》中通过士人群像，赋予这一观点深刻历史内涵与实践意义，即真正的道德超越非纵情逞欲，而是在权位、利益面前主动“知止”，以内在定力守护精神纯粹性。《循吏列传》中所载的鲁国宰相公仪休事迹便是对“知止有定”理论内涵的道德实践。作为鲁国宰相，公仪休“奉法循理，无所变更，百官自正”的施政风格，以及“使食禄者不得与下民争利，受大者不得取小”的道德原则，切中肯綮地体现了其对权力界限的严格恪守。在面对“客有遗相鱼者”的赠与时，公仪休却作出“以嗜鱼，故不受也”的理性判断，这一拒绝建立在对权力腐败机制的深刻认知之上，其深刻洞悉权力腐败的本质规律，而将个人道德上升至政治原则层面，以期于根源处杜绝权力寻租。在“食茹而美，拔其园葵而弃之。见其家织布好，而疾出其家妇，燔其机”极端行为的背后，是其为官者不与百姓争夺利益政治信念的彰显，通过主动消除官员家庭的经济竞争优势，从而维护市场公平。《史记·孔子世家》记载正考父的行为范式也体现了典型的“知止有定”特征：“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三次受命，姿态愈发谦卑，甚至“循墙而走”，以示不敢骄矜。他的行为并非故作姿态，而是深谙“高位易倾”之理，故以自我约束来平衡权位带来的潜在傲慢。此二者通过“知止有定”的自我约束，在权力追求中以道德超越寻得了平衡之道。

3.2 “发愤著书”说：立言精神之升华

天汉三年，太史公遭遇李陵之祸，身残形毁，在残酷现实与理想抱负的冲突下，司马迁提出并形成了中国古典文艺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命题——“发愤著书说”，其核心在于揭示个体身处巨大困厄与精神压迫时，如何通过“立言”这一创造性活动实现精神的突围与升华。《太史公自序》有言：“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司马迁以八例作总括，认为作家在现实生活中受压抑、残害而生的郁愤乃是创作的根抵。在社会生活中，作家遭受的压抑、残害越厉害，郁愤就愈深，创作的动力就愈大，写出的作品思想性就愈强^{[8]27-31}。

关照司马迁本人，其因推言陵功而触怒武帝，面临诬上死罪。此时他所面临的正是传统士人最严峻的价值困境：若选择死刑守节的极端形式，则才怀随和，行若由衷的抱负将终不可用；若接受宫刑苟活，则诟莫大于宫刑，使刑余之人永远丧失士大夫的道德身份。“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的剖白，使这种撕裂达至顶点。正是这种道德与功名的双重绝境，催生了“发愤著书”的精神突围，他将“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的终极动力，锚定于“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的立言使命，决然将个

人屈辱升华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宏大叙事。孔子周游列国七十而无所遇，其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的功名挫败，直接催生了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的《春秋》笔法；屈原放逐后而遭谗蔽，在《离骚》中以“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的文学创造，将政治失意升华为与日月争光的精神丰碑；韩非囚秦而著《说难》《孤愤》，将法家理想注入文字，使功名从爵禄转化为思想影响力。上述先贤亲身经历表明，“发愤著书”绝非消极避世，而是志不得伸者在绝境中追寻的精神突围。当传统“立德”“立功”之路因政治压迫、道德污名或命运摧折而阻断时，“立言”将成为维系士人精神尊严与历史价值的平衡途径。

“知止有定”和“发愤著书”是士人在道德与功名的两难困境中，突破三类典型生存模式、实现精神突围的关键路径，让士人在矛盾中找到了平衡之道与价值归宿。

4 结语

《史记》深刻揭示了古代士人群体普遍面临的道德理想与功名追求两难困境。面对这一抉择，士人或为坚守道德而殉道，或陷于道德与功名的矛盾中挣扎，或顺应时势而寻求平衡。司马迁通过记载士人群体的复杂抉择，不仅呈现了他们在历史夹缝中的挣扎与韧性，更以其“实录”精神，赋予不同路径以历史的评价，展现了士人突破现实困境、寻求精神不朽的多种可能性与悲壮色彩。同时，这种书写本身，亦是司马迁本人面对两难困境所进行的一种精神突围。

参考文献：

- [1] 廖雯. 从《魏公子列传》探究司马迁的理想主义精神[J]. 牡丹江大学学报, 2018, 27(12): 43-45.
- [2] 张英. 从“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看儒家生命价值观[J]. 理论探讨, 2007, (02): 55-58.
- [3] 熊良智. 司马迁《屈原贾生列传》的“一家之言”[J]. 文学遗产, 2013, (01): 15-26.
- [4] 任刚. 《史记》人物取材研究[D].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 2007.
- [5] 房雪琴. “士志于道”——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理想人格[J]. 天府新论, 2003, (04): 102-104.
- [6] 李玉洁. 春秋时代晋国尊贤尚功与世卿世禄制度探析[J].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 (01): 138-141.
- [7] 高晓庆. 论《史记》中士的文化人格[D].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 2009.
- [8] 俞绵超.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及其影响[J]. 六安师专学报, 2000, (03): 27-31.